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东方学术文库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宗教学卷

王雷泉 刘仲宇 葛壮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宗教学卷

王雷泉 刘仲宇 葛壮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宗教学卷/王雷泉等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ISBN 7-208-05762-1

I. 二... II. 王... III. ①社会科学-历史-中国-20 世纪

②宗教史-中国-20 世纪 IV. C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7697 号

主任编辑 虞信棠

责任编辑 虞信棠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 宗教学卷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

王雷泉 刘仲宇 葛 壮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34.5 插页 5 字数 638,000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208-05762-1/C · 210

定价 59.00 元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

总编委会

主 任：李储文

副 主 任：潘世伟 施岳群 武克全 陈 昕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荣生 尹继佐 王邦佐 叶 澜

朱耀人 张仲礼 李伟国 姜义华

赵 凯 奚洁人 莫建备 谈 敏

郭志坤 巢 峰 彭希哲 潘悟云

办公室主任：朱耀人

副 主 任：徐中振

工 作 人 员：黄 亚 叶月萍 陈小兵

总 序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肇始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经过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它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它所积累起来的关于现代中国及其历史的新知识系统,同一个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积累起来的新知识一起,构成了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变法运动应运而生,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哲学等由此萌发。八国联军之役后,革命和立宪勃兴,民主、共和、宪政成为志士仁人的主导诉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一一初步成型,传统的史学、文学等,也开始了所谓“史学革命”、“小说革命”等。“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后,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经大体建立起来。“九一八”事变以后,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妄图一举灭亡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则在危难的考验中迅速向前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科学借鉴和参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相应的教学科研体制和学科结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世界及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新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再一次调整了自己的发展路向,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普遍繁荣。

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成长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中国拥有数千年延续不断的丰厚的学术文化积累为其底蕴,同时,又积极而主动地广泛吸取了世界各个国家精神生产的优秀成果。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从诞生开始,便立足于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实践,投身于中华文明转型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运动,在这一基础上努力发现与创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过程,就是它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面对

种种历史性的与世界性的挑战,努力探索、努力进取、努力再创造的过程。

一个世纪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造就了坚实的精神支柱。在这一百年中,中国社会科学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对先行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每一次重新估定,不仅带来社会科学一次大的飞跃,而且带来一场普遍的思想解放,更带来民众素质的一次广泛提升。事实上,重新估定至今仍一直在持续之中,这就造就了中国社会科学与时俱进、先进性及多样化相结合的品格。

第一次重新估定,是对于在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传统经学乃至传统儒学的重新估定。康有为曾用进一步神化孔子、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通天教主的办法,来否定两千年来所尊崇的经学、儒学。章太炎则用“订孔”的方法,将孔子定位为功勋卓著的古文献整理和保存者、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学家,将“经”定位为由孔子整理和保存下来的一批古文献。他们从不同角度引导人们对传统经学及传统儒学重新加以审视。这一重新估定,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达到高潮。“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标志着传统经学与儒学的统治地位已经严重动摇。这一次对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的重新估定,同科举制的废除、新式教育制度的建立相配合,结束了“读经”为教育首要甚至最高使命的历史,解放了因“独尊儒术”而长久被压制的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等大量的其他资源,包括被视为异端的诸子学说,被视为“奇技淫巧”而从来不受重视的古代科学技术成就,被视为不可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作品和内容极为丰富的佛学思想资源等等;儒家学说本身也得到了较为客观的梳理,特别是孔孟程朱之外各派儒家学说,得到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尤为重要的是,人们由此开始摆脱了传统的“经传注疏”式的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挣脱了除去只能为经作传、为传作注、为注作疏,此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的精神束缚,获得了了解东西各国学术、思想、文化成果,独立进行探索、思考、创造的广阔空间。当然,经学的影响并不会因此而终结,传统的“经传注疏”式的思维方法和治学方法也没有就此而不再为人们所依循。在第一次重新估定各种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等资源时,粗疏和形式主义之处甚多,甚至使用新的“经传注疏”方法来取代传统的“经传注疏”方法。尽管如此,这一次重新估定所带来的思想解放,却是无可否认的。

第二次重新估定,是对于中国人曾经热切憧憬过的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及西方主要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当中国人开始以西方为师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勃兴,资本主义的各种内在矛盾已经明显暴露,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日渐广泛而激烈。二十世纪初,一批立志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先进中国人,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在规划中国未来发展时,已在考虑避免资本主义前途。领导反清革命的孙中山便曾要求加入第二国际,并解释“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即社会主义。他所拟定的实业计划,要将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根本宗旨就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1〕。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而争取社会主义前途成了更多志士仁人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其他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流派在中国的传播,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稍后日本军国主义、德国法西斯主义的肆虐,都使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所构建的理想世界以及这些国家发展道路所曾燃起的热情进一步破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科学界除翻译介绍了十七、十八世纪以来启蒙思潮的一批代表作外,更热衷于介绍的却是批判资本主义各种思潮的一批代表性著作。出国留学的,赴苏联的固然主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国际及斯大林观点的教育,赴欧美日本的,很多人所接触的也是从不同角度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揭露批判的思潮。当时,倡导自由主义的胡适一派许多健将,都深受拉斯基和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正是这一番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和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重新估定,使人们能够批判性地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成就,在向西方学习时不迷信西方,看到西方成功之处时也注意到西方的问题,从而思考如何从东方的实际、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合乎中国特点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即是这一阶段思考和实践的集大成理论成果。

第三次重新估定,是如何以科学的态度对待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并成为国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作为马克思

〔1〕 见孙中山《实业计划·结论》,《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第398页。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社会科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飞跃,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但是,由于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误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许多错误的、片面的、教条式的理解或解释,包括已经为马克思、列宁所放弃和改变的观点,一度占据了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支配地位,而不少马克思、列宁所坚持的,包括毛泽东曾坚持了的观点,反而被当作错误的或过了时的见解被抛在一旁。这就使人们的思想,使社会科学的发展,套上了新的桎梏。在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运动,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经历了重大挫折以后,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迎来了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这一思想解放,就是通过对于曾经支配了我们决策和行动的指导思想检验标准的重新估定,开始挣脱许多教条式的、片面的乃至错误诠释的禁锢,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新的理论成果。由此,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品格,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中国社会科学立足于中国实践以及当代世界发展的实践,努力使实践上升为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的飞跃;同时,以更加积极更加开放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外各学派的研究成果,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不断丰富自身;由此又推动了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及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学术、思想文化的再估定,即对前两次重新估定的全面检讨和对先前学术、思想、文化资源的新发掘。这样,就迎来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百年来的三次重新估定,每一次都为中国构建起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一个新的范畴、概念、话语乃至范式体系,给中国的救亡图存,给中华文明的转型,给中华民族的复兴,给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方案。中国社会科学也由此走向社会,走向民众,渗透到人们的整个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之中,渗透到社会制度的全面变迁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始终面临一个如何更加贴近中国实际以及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问题。它既需要创造性地继承和扬弃传统学术遗产,又

需要批判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的有益成果,还要不断反对教条化、公式化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时代精神和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不断前进。上世纪三十年代形成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上升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地位。当二十一世纪来临之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专门发出文件,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强调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对于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如何加强基础学科和应用对策研究、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微观运行机制建设、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与对外开放,一一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目标就是努力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到来。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聚集上海专家学者力量,以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为研究对象,爬梳各主要学科的形成及其演进轨迹,旨在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反映这一百年间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全貌及其规律,促进它在新的世纪更加繁荣和发展。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百年发展的实际情况,参照当前新的学科分类,本书共设十三卷,即马克思主义卷、哲学卷、理论经济学卷、应用经济学卷、法学卷、政治学卷、教育学卷、历史学卷、社会学卷、语言学卷、新闻学卷、宗教学卷、文学学卷。各卷框架及主要内容为:第一部分系总论,综述各学科一百年间从形成到发展、从创新到繁荣的演进轨迹;第二部分以二级学科为单位,论述各学科在一百年间所取得的主要成就;第三部分以专题形式,介绍各学科在一百年间发生的重大论争情况,评述它们的学术意义;第四部分综述各学科在一百年间建立的主要学术机构、重要学术社团、重要学术刊物及进行的中外学术交流,说明它们对本学科发展所起的作用;第五部分为附录,内容是各学科的百年大事记。由于

受主客观条件限制,各卷撰写之详略难免参差不齐,甚至有所疏漏。

本书编纂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大型学术工程,历时三年多,一直得到原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现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龚学平,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仲伟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为了加强编纂工作的领导,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成立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总编委会,负责编纂计划的制定、框架的设计、各卷主编的聘请、各卷编撰大纲的审定,以及出版等事宜。各卷设主编,承担本卷编撰的各项工作。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等单位近二百位学者,参加了各卷书稿的撰写;有四十多位资深学者应邀审读有关书稿,提出了不少重要的修改意见。这项工作也得到了上海市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将本书的编纂列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科学地展现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需要人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加以研究与探索。现在出版的这十三卷研究成果,是我们初步的尝试。我们竭诚欢迎各种建议和批评,并期望这方面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总编委会

2004年12月

目 录

第一编 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现代宗教学的兴起	003
(一) 西学东渐与社会新思潮的兴起	003
(二) 社会新思潮促进下的当代宗教学科之形成	004
(三) 东西方宗教思想的交流与碰撞	007
二、宗教批判运动与宗教主体思想的发展	012
(一) 信仰自由精神的兴起与宗教主体思想的发展	012
(二) 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宗教观	013
(三) 宗教与科学及无神论关系的讨论	015
三、宗教界对社会挑战的回应和宗教文化的振兴	018
(一) 基督教的社会运动与教会学者的研究	018
(二) 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	020
(三) 伊斯兰教文化高潮及其意义	022
(四) 宗教学研究的展开及其成就	023
四、建国以来宗教学研究的历程	027
(一) 改革开放前宗教学研究状况	027
(二) 八十年代以来宗教学研究的全面繁荣	029
(三) 世纪之交宗教研究的态势与展望	035

第二编 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各学科的发展及主要成就

一、宗教学原理与各种分支学科及宗教通史研究	043
(一) 宗教学原理研究	043
(二) 各种分支学科的研究	063
(三) 关于中国宗教通史的研究	072
二、佛教研究	085
(一) 二十世纪佛教研究的进程	085
(二) 佛教史研究的展开	094
(三) 教理与佛教哲学研究	105
(四) 藏经编纂与经籍研究	134
(五) 佛教文学艺术之研究	151
(六) 佛教制度与社会生活之研究	168
三、道教研究	179
(一) 二十世纪道教研究的进程	179
(二) 道教史研究的全面丰收	183
(三) 道教经籍的整理与研讨	190
(四) 道教教义思想与哲学研究的深入	199
(五) 道教科仪研究	206
(六) 道教符箓法术研究	210
(七) 道教名山宫观研究	219
(八) 道家养生学和内丹、气功学探索的兴盛	224
(九) 外丹黄白术和其他科学研究的丰富成果	229
四、基督宗教研究	235
(一) 唐代景教研究	236
(二) 明清耶稣会传教士研究	239
(三) 中国东正教研究	244
(四) 中国基督新教研究	246
(五) 中文《圣经》翻译	250
(六) 中国大陆神学研究	255

(七) 香港、台湾的神学研究	263
(八) 教会大学研究	267
(九) 基督宗教和中国文化及文学研究	273
五、伊斯兰教研究	279
(一) 伊斯兰教研究的进程和基本特点	279
(二) 对《古兰经》的多次翻译、出版及其成就	296
(三) 有关伊斯兰教历史的重要论著	301
(四) 关于教义学、教法学研究	309
(五) 对伊斯兰文化的探讨	315
(六) 关于当代伊斯兰教的研究	320
六、其他宗教研究	330
(一) 儒教研究	330
(二) 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	337
(三) 民间宗教与民俗信仰研究	343
(四) 原始宗教与神话研究	350
(五) 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印度宗教、犹太教等研究	359
(六) 新兴宗教研究	370

第三编 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重大学术问题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研究	383
(一) 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384
(二) 关于“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问题	386
(三) 关于“宗教五性”	387
(四) 关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388
二、关于宗教与迷信关系的学术讨论	391
三、宗教与农民战争	395
(一) 道教及其经典《太平经》与汉末农民战争	395
(二) 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	397
四、《楞严经》、《大乘起信论》辨伪	402
(一) 《楞严经》辨伪	402

(二)《大乘起信论》辨伪	403
五、关于禅学研究之争	407
(一)考据的困境	407
(二)方法之争	409
(三)禅学源流及演化	411
(四)经验主义的现代禅	413
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本色化和处境化的讨论	417
(一)基督教会的本土化运动	417
(二)神学思想的处境化	419
七、关于“文化基督徒”的讨论和争议	422
八、关于新兴宗教的研究	427

第四编 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主要学术机构、学术活动与学术出版

一、宗教学教育、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	435
(一)宗教学教育机构	435
(二)研究机构	438
(三)主要学术团体	442
二、主要学术会议	443
三、主要刊物、丛书、工具书的编撰和出版	459
(一)主要宗教学学刊	459
(二)主要宗教学论文集	467
(三)主要宗教学丛书	469
(四)典籍、资料与工具书	471
四、重要研究成果书目与部分主要译著书目	478
(一)重要研究成果书目	478
(二)部分重要的宗教学译著丛书与书目	496

附录 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发展大事记	503
-------------------------	-----

后记	536
----------	-----

第 一 编

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学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现代宗教学的兴起

吕大吉在《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研究一百年的回顾与展望》文中,将中国现代宗教学学术研究的百年历程,大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从戊戌变法到民国时期,时间跨度大约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其特点为:“‘西学东渐’和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术研究的兴起”。第二,1949年至1976年,从中国现代史的角度看,即所谓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其特点为:“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下的宗教研究”。第三,1976年以后,现代史上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其特点为:“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1]。上述划分,就其作为一个大略的划分,有中国现代史及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史学依据;并且基本符合百年中国宗教学术研究演进的史实特征。

(一) 西学东渐与社会新思潮的兴起

现代中国宗教学的兴起,是在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渐背景下发生的。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西学东渐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西学的译介中,日本乃是一个中转站。有研究者称:“以日本为接触、介绍外国文化的中转站,这是当年的思想文化界的大趋势。最直接的原因是留日学生数量大大超过留英、留法学生乃至所有其他各国留学生之总和。”^[2]在接受和引入西方文化方面,日本是中国的先驱和老师。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留日学生,在译介西学时,不仅采用了西方著述的日译版本,而且采用了许多日语转译的西方科学词汇。西语“宗教”(religion)一词,就是通过日译转译为汉语的。

伴随西学东渐而来的是中国现代社会各种新思潮的兴起。除了上述风靡近半个世纪的进化论思潮外,这一时期在社会上出现的各种新思潮包括:生命哲学(或生机哲学)、无政府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或实验主义、各种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接踵出现的各种西方文化思潮,构成所谓的新学和新文化,以其现代性或